

与下,年轻的师生们发扬先辈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精神,克服各种历史性困难,用自己的双手研制成一套套当时根本无法购置的科研与教学实验仪器,装备了初创的专业实验室,初步满足了教学、科研和专业发展初期的需要。由于科研、教学、专业建设的成果,核物理专业于1960年被评为校、省先进集体,我被委派代表核物理专业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师生们研制的部分教学科研仪器参加了大会展览,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参观和接见。此一事还被列入“1902-1988 南京大学大事记”中。

在施先生直接领导和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核物理专业迅速成长壮大,教师队伍最多达50余人。科研方向也很丰硕,既有基础、前沿的研究项目,也有

高科技应用研究项目,先后开展了核理论、粒子物理、实验核物理、穆斯堡尔谱学、核电子学、核探测技术、粒子加速器、中子物理、中子技术应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多层面的科研成果。施先生对所有项目的研究都给以热情支持和鼓励。例如在加速器攻关项目研究中,施先生虽未直接参与,但他却对我们高度关注与支持,不时给我们推荐一些权威专著和有价值的学术论文。

数十载与施先生的相处,却似弹指一挥间。缅怀慈祥豁达的施先生,思绪万千,不能自己。施先生安祥而坚实地走了,在深切缅怀施先生之际,联想起爱因斯坦一个著名告诫:“一个矛盾的实验就足以推翻某一理论”。这与施先生重视实验的谆谆教导是多么的一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借鉴。

怀念施士元恩师

丘第荣

2007年9月28日,我大学的同班同学郑乐民从北京大学来电话,告诉我说施先生去世了,约我联名发唁电送花圈,并说施先生的女儿是他的学生,所以能及时得到这讯息。很感谢乐民,使我有机会向施先生表示哀悼。

1999年我从国外回来,曾去拜望过施先生,之后就没有机会再去看他,今后再也看不到他了。施先生一百岁了,他的仙逝虽不意外,但自受业到共事相处以来,不止半个世纪了,还是令人感慨万分,想起许多往事。他的科研、教学业绩众所周知,用不着我多说,我只想讲点未见报道过的事情:

施先生用人不受当时政治气氛的影响,解放前,物理系里,吴衍庆、简耀光和我三人是闹学生运动、罢课游行的积极分子,全系知名,个别教授对我们很反感,但毕业后,施先生却把我们全留校,推荐简耀光到当时的中央大学医学院生化科郑集教授手下当助教,把吴衍庆和我留在系里。这就注定了我一生的航向。须知当年找工作是很困难的,“毕业就是失业”是当时很流行的一句话。由此可见能留在学校是多么幸运。简耀光和吴衍庆是党员,对解放后学校的接管和整改起着重要的作用。

南京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企图把中央大学迁走,大多教职工深知抗战期间中央大学迁

往重庆的苦难历程,损失又非常严重,都不愿意搬迁,但一般人都明确表态反对搬迁。在制止国民党这个意图上,施先生做了两件很关键的事情,一件是他把学校用来搬运图书的木箱装满了书,从二楼沿楼梯推下去,箱子破了,证明箱子不能用来搬迁;第二件事情是为了搬迁问题,理学院教职工在科学馆的阶梯教室开会讨论,当时,许多人只强调搬迁困难,但施先生则进一步用箱子破碎为依据,直截了当反对搬迁,更提出马上复课,因为当时,学校人心惶惶,无心上课了。在这种气氛下,会上没有一个人倾向搬迁,于是搬迁自然也就搁浅了。

也是南京解放前夕,我们系的毕德显教授要去解放区大连,我知道此事时,毕先生已到了上海,我把这情况告诉施先生,他一听就很着急,要我赶快代他写信去挽留(因为只有我知道毕先生的地址),我虽写信转达了施先生的诚意,但人各有志,毕先生还是去大连了。但是,从这件事情也可以看出施先生对我们系的事业是何等执着!

10月22日,收到郑乐民寄给我一本施先生著的《施士元——回忆录及其他》一书,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地细细地阅读,越看越像回到当年,又像看见施先生工作勤奋,待人亲切,宽宏大量的高大形象!他没有走,他还在我们中间!